

懷念戴傳賢先生

丁文淵

民國廿五年，政府特派戴傳賢季陶先生到德國去，代表政府參加世界運動會。戴先生只想帶一個人同去，做他的秘書。朱驥先家驊先生因我留德很久，在德國佛蘭克福大學擔任中國學院副院長，又替他們辦了一個中國民族博物館，便薦我充任秘書。戴先生欣然同意。於是我們便於五月十九日從上海乘德國船出發。

閒話當年

赴歐船程要廿多天。這時還算是承平時代，船上頭等艙位的各種禮節，都極為考究。譬如：每天起碼要換三次衣服，要刮兩次鬚鬚等等。戴先生從來沒有需要我提醒他一句，他每次都是早準備妥當。一切舉動，都能做到大方有禮。我心裏本來就怕國人不懂西洋禮節，現在這一塊石頭總算落下去了。以後我曾老實的問過戴先生，他沒有到過西洋，何以對西洋的禮節，能如此的熟練？他說：「這都是跟先生（總理）學的。」他說：「我們從前跟先生的時候，如果在政論上同他的意見不同，先生必定反覆的問我們辯論，夜以繼日的，必定要等到說服了我們，他才肯罷休。然而辯論是辯論，總是心平和氣的，從來不

肯用嚴詞切責。可是如果看見我們一時大意，不修邊幅，那時先生就不客氣的要教訓我們了。」

於此可以想見總理當年的風度。在船上廿多天，承戴先生看得起，處處以朋友相待，所以我們在精神上很快的就接近了。他談起來，可以說，上下古今，無一不談，談起來就是滔滔不絕，差不多戴先生的一生，在這廿多天以內，完全都談過。從他小時在成都求學時代說起，如何鬧風潮，如何十五歲就隻身從成都到上海去求學，如何在漢口把他所帶的銀子——盤川學費——都給騙子騙去。

原來那個時候出門不是像現在，交通固然煩難，滙兌也是不便。戴先生所帶的銀子——大約是二百兩——放在一個考籃裏面。考籃又笨又重，在漢口上岸的時候，拿又拿不動，給人拿不放心。他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，就被碼頭上的騙子所乘，跑來一搶，拿起就走，嘴裏還說替他代拿，在人叢中一混，就不見了。戴先生那個時候急得就要哭起來，幸虧同行的有一位族兄，才算能够安然的到了上海，以後才輾轉的到日本去留學。他因為年輕，又聰明，所以日文日語都學得很好，因此同日本人的交往也很多。

大禍臨頭

戴先生說他在留學時代，認識了日本中下社會的情形，以後跟總理在日本，又認識了日本的上層階級。那時的日本剛在明治維新以後，一般人都陶醉在君主立憲之下，真能實行了政黨政治，這個時代的環境，可算影響了戴先生的一生。有一次，日本某友黨在他們開會改選的時候，曾請過總理協助。戴先生曾參加他們的競選，替日本友黨的候選人到日本到處演講，當時很受日本人的歡迎。戴先生對於日本明治的維新，極端崇拜，他對於維新時代的掌故也很熟。所以對於西園寺元老，也很推崇。他同西園寺見過好幾次面，而且作過深談。他說日本近十餘年來（這是民國廿五年的事），所有的國家大事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天皇都要取決於西園寺的。戴先生又說，西園寺除奉日本天皇召詢外，其他一切，從不過問。平時深居簡出，同他沒有關係的人，根本見他不着，清高自勵，所以能够朝野欽佩。看戴先生歷年的言行，也是走上了這一條路，所以我會同他說：「然則戴先生將成爲中國的西園寺了。」他說：「西園寺是何等人物，我豈敢同他比擬。」

「雖如此說，而先生的本意，未嘗不流露於此。

張勳復辟的時候，戴先生曾奉總理之命，到日本去秘密訪問日本政府對復辟的態度。戴先生一到日本，就先去訪問他所認識的海軍部軍令部長某先生。戴先生去的時候，此公正在家中靜坐，戴先生被帶進房內，就坐在此公的對面，因為主人正在靜坐，不敢驚動。等候了一個多鐘頭，此公才睜開了眼睛，先問戴先生住在那裏，戴先生說住在海邊一個某某旅館，此公就說：「你的來意，我也明白，不過你眼前就有大禍來臨，如果不趕快躲避，恐將有性命之虞，你應當趕快回旅館搬家，搬到山上某某旅館，非特可以免禍，大約你過了一兩天，你就可以回國去了。」說完，又將眼睛閉住，做他的靜坐工夫去了。戴先生不得已，趕快辭出，就依照此公的話，當天就搬了家，到了山上那個旅館，才曉得同張勳有關係的人物都住在那裏。兩天以後，他們活動的情形，已經一目了然，而且曉得日本政府對他們頗為冷淡，不過他本來所住海邊上的那個旅館，已經在第二天因為風浪突發，被水沖沒了。戴先生就不得不相信這位軍令部長的話了。他回到上海報告了總理，曾問那位軍令部長，何以如此有先見之明。總理說這事毫不稀奇，此公既為海軍部軍令部長，當然隨時得到天文與氣象的報告，當然可以曉得海邊上的旅館要被沖沒，同時他當然也有報告，曉得張勳的一批人住在那裏，他不願意直接有所說明，就用這種神奇的方式，來指點你罷了。

免費老師

戴先生又談到他十九歲就從日本畢業回國，當時在蘇州官立的高等學堂做教習。那個時候的教習，大部是翰林進士人物。戴先生年未弱冠，就參攷其間，也可算是少年得志了。他也就因為少年得志，大有旁若無人之概，人又風流，當然常常尋花問柳，因此忌妬他的人也不少。有一位夏先生就在巡撫面前大進讒言，說戴先生行為不檢，不足為人師表。不料那位巡撫雖是滿人，却甚愛才，並不以此為病。他對夏說：「年輕人誰不是如此？你在年輕的時候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，何足為病。」因此終這位巡撫時代，戴先生仍能安於其位。雖然如此，戴先生自從在政府擔任職務以後，他對於私生活就極為檢點，決不肯因為一己所好，有礙官箴，這是我十多年來，親身所見的。當我們在歐洲的時候，有人勸他不妨逢場作戲，觀光觀光，戴先生總是婉言謝絕，從來沒有作過狹邪遊。這種地方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律身守職。蘇州的文人多有坐茶館的習慣，戴先生既然住在蘇州，當然也不能例外，他每天都到一個茶館會友品茗，並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有一天忽然有一位中年紳士貿然移坐到戴先生的桌子上來，打過招呼就在那裏品茗躬聽，不發一言。戴先生也不以為意。仍然照常談論。此公臨行，問明了戴先生的地址，自己也介紹是張某某，一位候補道。第二天他老早就到了戴先生的寓所來拜望，一見面就老實不客氣的對戴先生說：「老弟，你確是後生可畏，可惜聰明有餘，而學問不足，你讀書太少，應該趕快多讀！」說完就拿出了好幾本書籍出來，叮囑戴先生必定要讀。

戴先生雖然少年氣盛，然而對這一位儒雅的人士，而且年尊意誠，也就不能不表面上裝作接受他的好意了。但等到他一走，書籍置之高閣。不期這位張先生竟是古道熱腸，也不知同戴先生那裏來的一種緣分，居然不辭勞苦的每天親來拜問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來考問戴先生讀書的成績，質疑問難，刺刺不休；教之誨之，孳孳不倦。戴先生本來天資聰明，稍事瀏覽，就能知其概要，因此並不妨礙他平日的行動，但這位張先生不管茶館，或是妓館，他總追隨而至。往往在花酒場所，他拖了戴先生在旁邊一坐，就執卷問題，戴先生也真無如之何，所以戴先生說，他年輕時候讀書確實不多，以後對於國學能有基礎，不能不說是這位免費老師張先生之賜。原來張是張東蓀的哥哥，在「民權報」時代，張東蓀跟戴先生就常常打筆墨官司，各不相讓，可算是對頭。「然而他的這位老兄我却是很欽佩的。此公確是一位奇人，你將來不可不認識他！」可惜我們回國以後，不久就發生對日抗戰，因此我從來沒有機會拜識這位奇人。聽說早在數年前，此公亦已作古了。

通曉梵文

戴先生那年以特使的名義到德國去，當然到處都有演講。我為了慎重起見，本想在船上空閒的時候先做準備。可是戴先生說，他一向任何演說，都不事前準備，非到臨時看情形不可。而且演講的時候，應當隨時顧到聽眾，是否能夠接受他所講的話，所以事前無法準備。他又說，從前

總理也是如此，所以總理的演說，每次都能動人。戴先生在德國演講，大小共有十幾次，他總是臨時找題目，都能使人欽佩。大約每次他講六、七分鐘，我就翻譯一次。因為講演的內容有條理，詞句有斟酌，所以翻譯的時候，就不覺得困難。我在認識戴先生以前，因為在外國的時間較久，所以沒有機會聽過他的演講。起初要我做翻譯，我倒是很提心吊膽的。後來才曉得這一位名人的演講，確實與眾不同。這也算是我跟他工作當中一件愉快的事情。戴先生到了德國以後，德國的軍界名人薩克特、國防部長勃隆拜爾洛除了公宴以外，都曾在私宅款待，希特勒接見戴先生的時候，極有禮貌，談了廿多分鐘，表示非常親切。戴先生那個時候對於希特勒的虐待猶太人很高興，所以對他僅作一個禮貌上的拜訪。他跟戈林沒有多談，同戈培爾倒深談過一次。然而戴先生總以為此公三句不離本行，句句都含有宣傳氣味，覺得有點討厭。在瑞典的時候，他和斯文赫定也曾結交了一番，戴先生跟斯文赫定本來並不認識，是我同斯文赫定相熟，抽空去看他時，他聽說我是跟戴先生同來的，就打聽戴先生是何等人物。我說：「你上次能到新疆去調查，直接間接同戴先生都有關係，因為戴先生是主張開發西北最有力的人物，政府因為有意開發西北，所以才讓你去調查新疆。」因此斯文赫定就一定要來看戴先生。他們二人見面談得異常投機。斯文赫定本想要大大的招待，介紹瑞典幾位名人同他見面，其中也有當時的王太子。不過戴先生因為那時還沒到德國，不願意同瑞典政府人物先應酬，

所以就婉辭謝絕，以後僅答應在斯文赫定的家裏吃便飯，當晚談到深夜兩點鐘，一時高興，斯文赫定就在深夜陪同戴先生去看他還未開幕的蒙古博物館。規模很大，收藏的佛像也很多。戴先生一看，就可以將梵文的名字講出，很使斯文赫定欽佩不置，以後在瑞典的幾天，每天都是斯文赫定來陪同出去參觀名勝、博物館、美術館、圖書館等等。這樣我們得了許多便利，有許多珍品沒了件，平常都不展覽的，因為斯文赫定的關係，有經過任何外交手續，戴先生都看到發。在王室圖書館內還看見斯文赫定在我國古樓貴蘭現的漢朝紙張，這是世界上最古的真正的紙，古色斑斕，戴先生看了，愛不忍釋。

訓汪精衛

朱駱先生常同我說：戴先生看事確實具有遠見，這真是不錯的，我可以隨便舉出幾件事來證實。當我們從德國到了義大利，預備乘船回國的時候，接到了汪精衛的電報，請戴先生到法國南部海邊尼斯——汪在那裏休養——去盤桓兩天。我們到了那裏，汪就設筵招待，在座除汪同曾仲鳴以外，就是同戴先生。一共四個人一桌，語談甚歡，汪還叫旅館取出拿破崙時代的白蘭地酒來，二人就大飲特飲。不久，戴先生就法國文化情形，有所批評。大意說法國固然有他古老的文化，人也具有智慧，性情也頗溫和，有許多地方同我們頗相像，然而弱點也很相同；尤其近來法國多不尚進取，如果弄這一套來做我國模範，恐怕就要誤國云云。戴先生對於這個問題，反覆辯

論，聲色俱厲，我當時很怕太使汪難看，因為戴先生話中，明顯說出汪等一般人是如此主張的。幸而汪倒是神色不變，有時還同我開玩笑，問我何意見，並沒有不歡而散。以後我們回到臥室，戴先生就問我：「你以為今天講的話太過分了麼？」我說，我不懂戴先生為何要講得如此嚴重。他說：「我今天的一番話，並不是酒後失言，你要知道，像過去汪的為人，他回國以後，一定要想盡方法去執政。他雖然絕頂聰明，可是沒有見解，加以意志不堅，執政以後，恐怕就要出亂子，當然不是國家之福。既然是老朋友，在這樣一個幽閒的環境，更應當要對他做一個嚴重的勸告。」這是廿五年九月初旬的事。果然不過兩年有半，汪精衛已經作了漢奸，戴先生當時所講的話，說汪要爭權，沒有見解，意志不堅，可算是語語都應驗了。戴先生本來是一位才大識遠、奔放不羈的人物，又熱心國事，總不願以個人的關係，而有妨整個局面，所以他要做到與人無爭。他也會同我說過：「你不要看我對於許多事不聞不問，就會糊塗，我可是大事不糊塗！」他本來是一位陽性人，生平很豪爽，因為環境關係，又使他不得不慎重，所以他出言，往往非常微妙。他的個性是如此，地位關係，使他不能照個性去做，所以他內心常感覺得痛苦。一般人只看到他的消極，他的煩惱，反而對他的遠識、熱忱不加重視，是太誤會他了。假如他不是為官守所累，以他與人無爭的風度，評論事情的遠見，對國事的熱忱，在黨在國的資望，他確是我們所亟需要的一位「西園寺」元老。（選自時代文摘）